

烽火函峰

抗演三队在义马

抗敌演剧第三队(以下简称“抗演三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进步戏剧和音乐活动的一支革命文艺队伍。1940年秋至1941年春在渑池常村(现属义马)进行了长达半年的休整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深刻诠释了他们以文艺为武器,誓死抗战到底的精神和勇气。

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建政治部,其下设的第三厅负责战地服务及民众的组织与宣传。经国共双方多次协商,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同年4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正式成立,团结了众多学术界、思想界和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中国共产党希望将第三厅建成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机构,不久即在第三厅成立中共秘密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成员有郭沫若、阳翰笙、杜国庠、冯乃超、田汉、董维健,并在基层成立中共特别支部,冯乃超任书记、刘季平任组织委员、张光年(光未然)任宣传委员。

第三厅成立不久,周恩来即考虑在其建制下成立演剧队和宣传队。根据计划,第三厅“以汇合于武汉的上海救亡演剧队各队为基础,并选拔战地工作较久、人才较齐、技术较佳、成绩较著的剧团”,组成10个抗战演剧队。演剧队在武汉集中培训一个月后,分别派往各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其中抗演三队以张光年在武汉组织的“拓荒剧团”为基础组建,时有队员28人。队长徐世津、王负图,副队长赵辛生(赵寻)、彭后嵘,主要成员有田冲、郭析零、胡宗温、蓝光、史民、胡丹沸,张光年任支部书记。抗演三队的工作地点被定在西安,归第二战区政治部管辖。

1938年9月,抗演三队踏上奔赴西北的征途,边行进、边战斗、边宣传,先后在西安、洛川等地演出了《宣传》《大兴馆》《沦亡之后》《打鬼子去》《东北一角》《生路》等剧目。进入晋西北吕梁地区后,在抗战决死队二纵队工作,除进行慰问演出外,还帮助部队开展文娱活动,培养文艺人才。

1939年2月,因张光年受伤,经中央同意,第三厅派遣抗演三队进入陕甘宁边区休整。抗演三队在延安演出

了《抗敌歌》《大刀进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等抗战歌曲。同年4月13日,他们在延安最大的礼堂——陕北公学礼堂首次公演了由张光年作词、冼星海谱曲的《黄河大合唱》,郭析零担任指挥,田冲担任男声独唱,被誉为“抗战之花”的女歌唱家蒋旨暇担任女声独唱。首演引起了巨大反响,《黄河大合唱》迅速在中国大地传唱,成为激励抗战救亡的精神号角。

1939年6月,根据中央指示,抗演三队返回第二战区,在晋东南前线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在血与火的抗战烽烟中,抗演三队七渡黄河、四入敌区,宣传抗日救国,连续紧张地工作了15个月,有两位同志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还有不少同志患有各种疾病。为了使同志们恢复健康,总结两年来的工作,研究下一步工作如何开展,抗演三队决定在后方找个安静的地方进行休整。经事先了解情况,最后选定渑池常村。这里离渑池县义马火车站较近,既不引人注目,去洛阳又比较方便,是远离日军的后方,表面上比较安定,有利于做长期抗战的准备。

1940年10月,抗演三队30多名队员在队长王负图、副队长赵辛生的带领下从垣曲南渡黄河,来到渑池常村休整。他们在农家院里住下以后,做饭、洗衣等,一切依靠自己,从不麻烦群众。在劳动之余,他们恢复自修大学,制定了两个月的学习计划,除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外,主要开展艺术理论、演剧艺术、音乐训练等方面的业务学习,或集中读书研究问题,或到村外的幽静处练声、排练节目。在常村期间,抗演三队的队员先后编排演出了《祖国》《鸭绿江边》《新小放牛》《败家子》《何必呢》《放下你的鞭子》《黄河大合唱》等抗日救亡剧目。

在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的同时,队员们经常走进常村学校,为学生们辅导音乐课,教孩子们唱《松花江上》《太行山上》《保卫黄河》《黄水谣》等抗日救亡歌曲,教他们做“旗帜操”(即打旗语),培训童子军。在抗演三队的精心指导下,常村学生的音乐水平有很大提高,一连三年,在渑池全县学校歌咏比赛中,成绩都遥遥领先。队员蒋旨暇曾辅导一名叫张明礼的女孩学唱新歌,在渑池全县演出时获得了第一



名。抗演三队的宣传活动,受到村民的普遍好评,不但活跃了当地文化生活,也融洽了军民关系。

在常村期间,三队队员除与当地百姓和睦相处外,还到渑池等地慰问伤兵,并到洛阳参加义赈公演。1941年春,他们与抗敌演剧十队、抗宣四队在洛阳联合演出了《黄河大合唱》等抗日救亡歌曲,在洛阳引起巨大轰动,但也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怀疑与仇视。从洛阳回来后,抗演三队接到八路军洛阳办事处的紧急通知:国民党欲对其实施破坏行动,命令全体队员迅速撤离常村。

此时,蒋旨暇身患重病,不能同行,不得不留在村里,并由两名队员陪护。抗演三队离开不久,蒋旨暇因医治无效,不幸病逝,被当地群众葬于常村南地,并立碑纪念。1941年5月,张光年等在广西桂林为在抗战中牺牲的抗演三队烈士们召开追悼大会,特别提到了蒋旨暇的名字。

抗演三队在义马的半年间,积极占领抗战文化阵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坚持革命立场,开展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抗日宣传,极大鼓舞了军民的抗战士气,坚定了军民的抗战信心,对号召全民抗战和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门峡市委党史方志研究室供稿)

洛师在卢氏的抗战活动



湖北村洛师抗战办学旧址



湖北村洛师师生汲水用的水井



洛师师生在横洞青山千佛崖壁写下的“抗战必胜”宣传标语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军分路深入中国广大领土,对中国正面战场发起猛烈攻势。1938年6月6日,河南省会开封失守,河南形势危急。为避免日军侵害,洛阳、陕州多所学校纷纷迁往卢氏后方,其中,河南省立洛阳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洛师)是迁往卢氏办学时间较长、影响最大的一所。

1938年11月,洛师由洛阳迁至卢氏县城以西20里外的湖北村。湖北村地处偏僻山区,学校初迁于此,办学条件极为艰苦,教学、办公均被安排在山头村关帝庙、莫家祠堂等改造而成的12间教室里。因受战事影响,学校教科书日益匮乏,除国文、数学编印讲义外,其他各科教学都是教员板书学生笔记,实验教学基本从简。生活上,因战时经费短缺,师生常有断炊之虞。学生每月津贴仅够半个月的伙食费,为节约费用,学生每天两餐、轮流做饭,课余时间自己汲水、打柴、推磨。为抗战需要,洛师将军事教育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学生每周上两小时军事训练课,训练要求也极为严格。在艰苦的条件下,洛师坚持稳定的教学秩序。湖北村群众积极为师生腾出房屋,提供栖身之地,在生活方面给予了有力支持。

洛师迁卢后,发扬学校光荣的革

命传统,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学校剧团演出的《十二把镰刀》《流亡三部曲》《放下你的鞭子》《北地狼烟》等歌曲和剧目深受群众欢迎,学生们制作的墙报、宣传画、漫画、标语等遍布乡村院墙和洛河沿岸岩壁,极大唤起了卢氏民众团结抗日的决心。

1938年的卢氏县,只有个别党员活动,没有建立中共党组织。而洛师早在“一二·九”运动时就很有名气,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也建立了中共地方党组织。迁到卢氏后,洛师党支部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发展党的力量。1939年暑假期间,洛师党支部利用上层统战工作,促成进步县长李万里出面举办抗日救亡训练班。洛师党支部书记张象文被聘为政训员,在训练班宣讲抗日形势和抗日政策相关内容。同时,洛师党支部在学校举办了几期失业青年补习班,在补习文化课的同时介绍国内外形势和党的抗日主张,引导青年学生学习《大众哲学》《社会科学二十讲》等进步书籍。通过这些活动,广泛团结和培养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此外,洛师党支部还利用学校组织毕业班下乡实习、到山区进行社会调查之机,安排杨清敏、张心嵩、韩大化、张羽、张重坤等学生党员参加。在教学实习和社会调查过程中,他们

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广泛团结和教育群众,组织“青年读书会”,培养进步力量,在卢氏各地培养了一些党员发展对象,为党组织的建立创造了条件。1939年6月,赵致平以中共豫西省委巡视员身份来到卢氏,与洛师党支部取得联系,共同研究卢氏建立党组织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党员等工作,9月中旬,中共卢氏县委正式成立,赵致平任县委书记,崔宗舫、陈芝汉、张心嵩、韩大化、张羽为县委委员,其中韩大化、张羽两人是来自洛师的党员。洛师党支部为抗战时期卢氏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洛师党组织的革命活动很快引起了学校反动势力的注意。一些进步教师被解聘,洛师党支部书记张象文于1939年暑假突然被捕。不久,李万里也遭县反动势力的大肆攻击排斥而离开卢氏。1940年秋,接任洛师党支部书记的韩大化也突然被捕(后机警逃脱,前往延安),学校还借故开除了栾汝勋、张羽、王健美、庞学庵等6位在学校表现较为突出的学生党员的学籍。党员师生与反动势力开展了针锋相对、有理有节的斗争,进一步激发了革命热情。

由于洛师在豫西的良好声望,除豫西各县外,晋南、陕东南诸县学生亦

跋涉而来报考。1944年,洛师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达到12个班400人。在洛师迁入卢氏前后,洛阳中学、洛阳职业学校、许昌进德中学等学校也陆续迁至卢氏。在外地学校纷纷内迁的影响下,卢氏县政府及社会名流开始大力兴办学校。由洛师代办,先后创办了萃原初中、豫萃中学、洛师附小、幼稚园等,极大促进了卢氏山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使沉寂的卢氏文化教育界开始活跃。

1944年5月,日军侵犯卢氏。为保护师生安全,学生张耀汉(地下党员)、杨自立等发起组织了“洛师抗日游击队”,队员发展到200多人。他们到卢氏飞机场军械库领取枪支弹药,保护洛师师生安全转移到潘河、徐家湾一带。任务完成后,队员们抗日热情高涨,一部分学生毅然投笔从戎,奔赴硝烟弥漫的抗日前线。

抗战胜利后,1945年底,洛师迁回洛阳。在卢氏长达7年的办学中,全体师生秉持教育报国初心,克服重重困难,坚守教育阵地,传递杏坛薪火,为国家培养了千余名人才,与卢氏人民建立了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洛师在卢氏的抗日活动,在三门峡抗战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门峡市委党史方志研究室供稿)

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1月底,我离开了家乡——安徽当涂采石镇,流亡武汉。那时的武汉抗日救亡的声浪高涨,也激起我热血沸腾和满腔仇恨,决心投身抗日战场。但怎样才能投入抗日战场呢?正当走投无路的时候,我的同学来找我,说是光未然正在组织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并且准备到延安去,问我愿不愿参加。我高兴极了,跟着他们到了武昌巡道岭8号。这里已经集聚了10多人,有从上海、平津来的,也有武汉本地的,大多是无家可归的流亡青年,多半是中学生,也有大学生和职业青年。虽然素昧平生,但共同的灾难和命运将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见面就亲如兄弟姐妹,同吃大锅菜,同睡一地铺,一起排练节目,一起讨论时事。后来我才清楚,这是光未然领导的“拓荒剧团”影响下组织的救亡团体。

在武汉,我们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的大游行,在街头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演街头剧,夜以继日,不知道什么叫劳累。火热的战斗和生活,使我们感到,我们以自己的行动投入了抗日救亡的行列。1938年春天,我们已定名为“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话剧移动七队”,开赴湖北农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这年夏天,我们巡回宣传到襄阳、樊城,这时队里已经有了秘密的共产党小组。“七七”抗战周年前夕,我们返回武汉。此时,经周恩来、郭沫若等同国民党的斗争,决定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直接领导下,收编抗日救亡团体,将大批爱国青年组织起来,组成10个抗敌演剧队。我们“话剧移动七队”改为抗敌演剧队第三队。之后在武汉昙华林经受了短期的军事政治训练。在结业典礼上,我们听到了周恩来的演说,耳目一新,深受教育,我们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对于这位众所周知的共产党领导人,更是肃然起敬。我们当时想:参加抗演三队就是和共产党在一起了。

演剧队经过集训后,分赴各个战场。1938年9月9日,抗演三队从武汉出发去第二战区,即阎锡山管辖的山西敌后。那是一个艰苦的战区,但靠近延安,正符合我们的心愿,于是愉快地踏上了征途。1939年2月,我们终于到达延安,我们的愿望实现了。到了延安,就好像到了自己的家,一切都是那么自由、舒服,呼吸到的空气都是新鲜的。兴奋和欢乐,激发了我们演出的热情和创作的灵感。《黄河大合唱》就是光未然到延安之初和冼星海共同创作的,由我们首次演出,并获得成功,轰动了整个延安。

在延安短短的3个月,我们受到了生动实际的关于党性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后来根据工作需要,我们重新回到二战区。离开延安之前,中央组织部明确三队支部是他们直接联系的特别支部。特支经常对队员进行国际、国内形势的宣传和教育,队里划分了戏剧、音乐、文学、美术等学习组。我们对革命文艺工作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原来大多认为,无论戏剧、音乐、美术或文学,只是一种宣传抗日的手段。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参加游击战争,消灭敌人,才是我们唯一的目的。后来,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实践的感受才逐步认识到,文艺活动不只是宣传抗日救亡的武器,它本身也是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只有学习它、熟练地掌握它,才能运用它团结人民打击敌人。这个认识的转变,使我们懂得革命文艺工作的重要性,增强了革命事业心。大家有了共同的理想,对巩固团结和教育提高我们这个队伍起了重要作用。

1940年,我们住在河南渑池县的常村,用半年多的时间学习和总结工作,为进入抗战相持阶段作好思想上的准备,这在抗演三队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也是特支领导工作上一个提高。

从1938年到1946年,我一直在抗演三队。当年处于地下环境中的中共抗演三队特别支部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出生入死,英勇斗争,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真正成为这个队的核心,以强大的凝聚力,将全队队员紧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出色地实现了党所提出的目标和任务。

(刊于1988年《湖南党史月刊》)

1938年11月,洛师搬到距卢氏县城以西20里的涧北村。不久,学校以向社会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及维护校区治安为中心,成立社会服务团,由各班选派代表组成宣传组、治安组等。社会服务团是个群众性的组织,有几个党员参加,在其中起骨干作用。活动范围除校区外,也到附近村镇向农民群众及壮丁训练队进行宣传、講演、演节目等,曾在河北、横涧等地演过《小放牛》《放下你的鞭子》等节目。

1939年春节前我返回洛宁家中,同当地党员和青年进行演剧、唱歌、宣传党的政策等革命活动。学校当局实际负责人、教务主任梁枢庭得知后,以违反校规为由,要立即开除我的学籍,并已写出布告。党支部了解到这一情况,一面发电报催我返校,一面发动学生起来斗争,校区内到处都贴出反对梁枢庭的标语,并同他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同时,又派另一学生党员与梁枢庭的妻子(曾到延安抗大学习过)进行游说,终于迫使梁放弃开除我学籍的决定,使斗争取得胜利。

这年年初,洛师一些学生向重庆生活书店函购一批进步的社会科学书籍。我们从学校工人李光裕那里得知,他头几天把一包书由城里邮局取回,放在学校办公室内。但当我们向校方索取时,校方负责人却不承认收到此书。党组织就号召学生集中在校办公室院内,运用群众力量进行斗争,终于迫使校方将书交出来。为此党支部又提出新口号,要求派学生代表参加校务会,以免再发生损害学生利益的事。学校当局慑于群众威力,也不得不答应这一要求。

后来国民党的书报检查就更严了,在陇海路灵宝县车站邮局,设有专人检查邮件。但那个邮局所有我们一个党员在里面工作,一切邮件先经他手分拣,他就先把进步书报藏起来。所以洛师同学订的几十份《新华日报》和延安的《解放》杂志、西安的《群众》周刊等都能按时收到。

在湖北村,支部书记曾向班上党员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指示,说洛师党支部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建立卢氏县(包括栾川)党组织而斗争,要利用校址远离反动政治中心、校内党组织力量较强的有利条件,除在校内继续适当发展党员外,主要精力要面向卢氏全县各区乡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1939年春季开学后,洛师党组织利用到各区小学实习的机会,有意识地把毕业班的党员和表现较好的同学分到几个重点区第一批去实习,以便在当地发展党员建立和恢复党组织。我和张心嵩等去栾川,邵文举等去杜关,杨清敏等去朱阳关,都胜利完成任务。

这一时期,学校党组织已发展二三十个党员,毕业班共27人就有8个党员。我们党的力量大,进步报刊多,党在学校的活动近乎一种半公开状态。在此形势有利时,洛师敢于大胆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发展党员建立扩大党的组织,使党的威信在群众中得到提高,带来进步光荣、反动可耻的风气,在校内的几次斗争,能充分发动群众造成声势,从而使斗争取得胜利,也使国民党顽固派一定时间内不敢在学生中公开活动,并争取到使不少落后同学进步和保持中立。以毕业班为例,团结在党组织周围和保持善意中立的占70%以上。同时,洛师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大刀阔斧利用一切机会向卢氏县全境开展的工作,发展和建立党组织,取得较大成绩。

(写于1983年3月)

忆中共抗演三队特支的斗争(摘选)

史平

抗战初期洛阳师范党的活动(摘选)

杜之真